

报纸副刊

与中国知识分子的现代转型

以《晨报副刊》为例



报纸副刊

与中国知识分子的现代转型

以《晨报副刊》为例

张涛甫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报纸副刊与中国知识分子的现代转型:以《晨报副刊》
为例/张涛甫 著.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7
ISBN 978 - 7 - 5633 - 6644 - 6

I. 报… II. 张… III. ①报纸编辑-研究-中国②知识
分子-研究-中国-现代③大众传播-关系-知识分子-
研究-中国-现代 IV. G219.2 D663.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07501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肖启明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021 - 55395790 - 103/168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山东省临沂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华路东段 邮政编码:276017)

开本:960mm × 1 380mm 1/32

印张:7.625

字数:200 千字

2007 年 7 月第 1 版

200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30.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电话:0539 - 2925659)



作者简介

张涛甫，安徽省六安市人，新闻传播学博士后，现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中国传媒体制改革、大众传媒与政治、现代报刊史、社会转型与影视剧生产等。已经在《复旦学报》、《二十一世纪》（香港）、《中国传媒报告》、《现代传播》、《新闻大学》、《新闻记者》、《学术界》等中外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五十余篇。承担了全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等六项。

笔底波澜：百年中国言论史的一种读法 傅国涌 著
百年苦梦：20世纪中国文人心态扫描 孙郁 著
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1937—1947） 朱鸿召 著
报纸副刊与中国知识分子的现代转型 张涛甫 著

主编简介

向继东，资深编辑，湖南溆浦人，生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编辑文字，也写些文字。著有散文随笔集《生活没有旁观者》、文史随笔集《历史的真相》。主编有“往事书系”、《2005中国文史精华年选》、《2006中国文史精华年选》、“回望文丛”等多种。曾任《随笔》特邀副主编，现供职于某省报。

电子信箱：xjd53@yahoo.com.cn

责任编辑/武春野
责任质检/周伟
装帧设计/张媛俪

序

陈思和

以现代报纸副刊与新文学的关系而言,《晨报副刊》是一个最为典型的研究个案。在“五四”时期的四大副刊中,《京报副刊》虽然比较接近文学,但毕竟是后起者,而且内容也比较杂芜,《时事新报》的副刊《学灯》偏重学术,《民国日报》的副刊《觉悟》偏重思想,唯有《晨报副刊》兼有思想与文学两方面的追求,与新文学运动几乎是同步发展起来的。以《晨报副刊》的三大主编为标记:李大钊是《新青年》同人,新文学的发动者之一,在当时已经是思想领袖级的人物;孙伏园是文学研究会的发起者之一,著名的文学编辑,他团结了新青年集团解散后一批最为卓越的文学家,可以说是新文学继“五四”发轫期以后精英集团的核心人物;而徐志摩不仅仅是新文学著名诗人,也是英美留学生中的活跃分子,他周围聚集的新月派文人所从事的诗歌试验,显现了新文学从思想启蒙向文学自觉的转型。综合起来看,李大钊——孙伏园——徐志摩的轨迹,也是《新青年》——文学研究会——新月派的轨迹,描绘出新文学从思想启蒙——为人生的文学——文学自觉的发展轨迹。当然这不说明文学史的必然,因为在新月派文人鼓吹新诗格律的自觉自律外,还有更加接近社会运动的左翼文学在发展壮大。但是,我们联系《晨报副刊》与新文学运动的关系来考察,就不能不承认,《晨报副刊》在新文学发展过程中所起的影响和作用,大约是任何一家媒体都无法相比的。

张涛甫的这部论著的副题为“以《晨报副刊》为例”,为“什么”之例?我

想由此为例来讨论副刊与文学的关系,那是最为合适的个案。但是涛甫在学业上跨两个学科,先是中文系的现代文学专业,后是新闻传媒系的新闻史专业,他为这部书稿又是花了很长时间来进行修改,所以两个学科的视野都进入了这部书稿,其正题为“报纸副刊与中国知识分子的现代转型”,反映了新闻传媒学科的视野。书稿的前两章,集中讨论了《晨报副刊》作为现代知识分子公共话语空间的性质,后面三章从主编风格的角度来介绍副刊概况,兼有两个方面的探讨,第七章是关于外交与苏俄问题的讨论,似乎还是知识分子话语空间的问题,最后两章则返回文学问题。从全部书的结构上,作者的旨意似乎一直在两个主题之间徘徊游弋,尽管作者用了知识分子现代转型的视角企图将两者统一起来,但是这两个问题本来可以各做一部繁富大书,涉及许多重要的理论问题,如今通过一家副刊的相关特征予以集中探讨,必然有很多地方难以完全融合,面面俱到。因此,这之间形成了一个问题的空间,可以供我们进一步作深入讨论。

2

涛甫把《晨报副刊》放在知识分子现代转型的大背景下进行考察是完全合适的。近代中国士大夫阶级向现代知识分子的转型,是中国现代性的一个主要标记,其集中反映在价值取向的变化。古代士大夫阶级的价值取向是单向的,唯有通过科举仕途才能实现学统的价值所在,所以晚清士大夫阶级的杰出代表如康、梁、谭诸君子,都把改变中国命运的希望寄托在开明君主之上,企图通过自上而下的变法来实现自己的经国大业。但经甲午战争失败和戊戌变法再失败,一批头脑清醒的士大夫终于明白过来了,现在的世道变了。严复、张元济、蔡元培等人从千年宦海梦中惊醒过来,他们开始远离庙堂,或从事思想传播,或从事商业出版,或从事办学教育,在社会实践中不断开辟现代知识分子的公共活动空间,逐步确立起知识分子民间岗位的价值取向。现代报刊的诞生,正是这样一种知识分子转型的实践产物。作家可以在期刊连载中获取“笔润”,足以谋生;知识分子通过新闻传媒来通晓国事,大发议论,干预庙堂政治。这看上去似乎是知识分子在庙堂以外从事政治活动,其实是从传统的权力系统中分割出一个新的政治空间,通过面对社会公众来实现知识分子的民主参政理想。所以在民国初年的主要媒体新闻报纸,基本上是党办报纸,背后都有着政治力量的操纵和发挥其喉舌作

用,这正是知识分子刚刚从士大夫阶级分化出来的政治表现。这种办报传统为中国现代新闻事业的灵魂,直到1940年代后期,傅斯年还建议胡适“与其入政府,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足见报纸的精神背后充满了知识分子的政治热情。这是现代知识分子建立公共话语空间的初衷。

只有从现代知识分子把报刊建设为公共话语空间的角度,才能理解《晨报副刊》为什么会连篇累牍地讨论“苏俄问题”,就不会对李大钊通过声援苏维埃的政治主张,声色俱厉地呼吁当局“无条件的承认劳农政府,无条件开始中俄会议”,“不许沿用媚强欺弱的帝国主义式的无耻的外交手段来办理对俄外交”等态度感到奇怪,也不会对徐志摩发起的“苏俄仇友”大讨论,知识分子各抒己见的热闹场面感到惊讶。公共话语空间必须建立在民主的社会体制之上,为知识分子游离庙堂以后继续表达政治热情和天下精神提供驰骋的空间。因为这种政治热情的散发形式首先是作用于公众舆论的,所以我把它解释为广场型的价值取向。“五四”初期知识分子发起的思想启蒙运动正是在广场型的价值取向上,与现代知识分子公共话语空间的建立取得了一致性。研究《晨报副刊》的公共话语空间性质,就不能把报纸副刊仅仅视为娱乐性的“报屁股”,也不能视为纯文学的实验园地,它自然是要把新文学纳入整个启蒙运动的轨道之内,成为整个思想启蒙的一部分。

但是,从价值取向上说,现代知识分子的广场意识与民间岗位又并非是一回事,两者之间还是有重要差异的。民间岗位的标志是建立的专业价值体系。如新闻、文学、出版、学术、教育等等,一旦在社会上建立了具体的职业系统,它就有行会的性质,有其自身的价值取向,不仅仅以知识分子广场式的民主精神为唯一目标。民间岗位与广场精神之间有相同的价值观也有各自独立的地方,从新文学与现代启蒙精神的密切关联来说,涛甫在书稿中使用了“启蒙的文学”与“文学的启蒙”两个概念来解释,我觉得也是恰到好处的。因为新文学运动是从语言革命开始的,它一开始就具有双重的启蒙意义,一方面它需要用文学的形式来达到思想启蒙的作用,另一方面,刚开始试验的现代汉语本身也需要在实践中寻求美感的表达,即文学自身的追求。后者因为是语言文字自身的美感启蒙,实际上已经建立起一个自身的行业标准,即艺术的标准,美学的标准。它与作为思想启蒙工具的新文

学毕竟是有区别的。我以为这是新文学自身的复杂性,也是它的民间性和岗位意识赖以形成的标志。而在后者的形成过程中,《晨报副刊》也同样起到了积极而重要的作用。涛甫在书中对鲁迅的《阿Q正传》的形式分析与周作人关于“美文”文学观念的分析,都比较有说服力地阐明了这种分化的标记。我在前面通过三位主编的风格来勾勒新文学的发展轨迹,就是为了说明《晨报副刊》是如何通过对文学自觉自律的追求,最后完成新文学自身价值取向的。在新文学的这一发展过程中,周氏兄弟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从李大钊(其背后是新青年集团)到孙伏园(其背后是周氏兄弟为代表的语丝派文人集团)再到徐志摩(其背后是新月派文人集团),我们可以看到新文学的双重启蒙观念是如何慢慢形成的,现代知识分子的三种价值取向(庙堂取向、广场意识和民间岗位)是如何慢慢在实践中消长演变的,而现代知识分子的转型也在这过程中慢慢地完成。

4

涛甫兼用两个学科领域的视野来考察《晨报副刊》,并着眼于传媒与现代知识分子关系的探讨,我认为是非常有价值的。但稍感不足的是,这又是一个内涵过于繁复的课题,需要有更多的资料来证明其设定的理论,梳理其内在演变的脉络,就书稿现在的篇幅和论述而言未免简单了一点。如果作者以后有充裕的时间,可以作进一步的梳理和探讨,将会获取更大的成绩。现在书稿发排在即,涛甫约我为书稿写几句话作为序言,我读完书稿,反倒对这个课题激起了很大的兴趣。所以不揣鄙陋,表述如上意思,供涛甫进一步研究时参考。

2007年2月10日子黑水斋

目 录

序.....	1
第一章 中国近现代报刊与中国知识分子的现代转型.....	1
第二章 《晨报副刊》: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话语空间	28
第三章 李大钊时期的《晨报副刊》	47
第四章 孙伏园时期的《晨报副刊》	64
第五章 徐志摩时期的《晨报副刊》	107
第六章 周氏兄弟与《晨报副刊》	134
第七章 《晨报副刊》与苏俄问题	158
第八章 《晨报副刊》与中国现代文学	173
第九章 文艺的自觉.....	194
第十章 冰心、沈从文与《晨报副刊》	213
结 语.....	227
参考书目	231

第一章 中国近现代报刊与中国知识分子的 现代转型

一 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困境

1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社会转型。在长达几千年的农业文明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历经磨难,跌跌撞撞地走到近代社会,已经筋疲力尽,古老的中国也被折磨得千疮百孔,满目疮痍。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知识分子始终扮演着一个悲剧性的角色。依附于封建专制体制,道统深深地陷在不可救药的政统泥淖里,知识分子身陷其中,无法自拔,只能跟着下沉。可以说,漫长的中世纪实际上是中国知识分子不断地突围,又不断地被围剿、捕获的辛酸史。只有历史被迫进入“世界历史”、现代历史叙事的时候,中国这个古老的封建王朝才被强制性地纳入世界历史的宏大叙事中,这被强行介入的历史过程是充满了民族血泪的,但在物竞天择的进化论逻辑里,强者并不同情弱者的眼泪,大清帝国的天国梦被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击得粉碎。于是,民族主义问题成为空前的现实难题摆在中国国人的面前。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民族的道德和知识精英,被首当其冲地推到了时代大潮的最前沿。在这场痛苦的民族灾难中,知识分子自身随着时代的变化进行痛苦的涅槃,进行着历史性的角色转变。在这一场度日如年的历史阵痛中,中国知识分子完成了向现代转化的艰难进程。

陈思和先生曾对这一转化的过程做过深入的研究。他认为,“这期间包括了旧的文化价值体系随同旧制度崩坏而流失民间,新的文化价值体系几经聚散仍未成形,两者之间的主流文化在价值取向上表现出无法掩饰的虚无性与蜕变性,以至失落了精神庇护所的知识分子在风雨飘摇中无家可归,苦苦寻求。”他把这一转型期的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概括为三种意识:“失落了的古典庙堂意识、虚拟的现代广场意识和正在形成中的知识分子的岗位意识。”^①在这一曲折艰难的历史行程中,知识分子渐渐地摆脱了几千年来束缚在他们脖子上的精神绳索,从封建君权设下的政治圈套和人生陷阱中慢慢地逃了出来,经过长期跌跌撞撞的爬行,遭遇无数次人生碰壁之后,渐渐地开始从切身的历史教训中醒悟过来,吃力地找回自己的言说方式,努力用自己的眼睛看世界,用自己的声音表达。

中国历史在其演进过程中,知识分子(士)承担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不仅有思想、文化以及道德担当,他们同时还有世俗政治的理想和诉求,他们不满足于在道统和学统的天地里过日子,他们的内心深处存在一个强烈的政治情结。他们在知识谱系的设计以及道德图谱中,始终怀有强烈的现实政治情怀。中国古代的“士”所建构的价值观和所追求的理想始终与现实社会的政治权力纠缠在一起,这就造成了知识分子很难拥有真正的独立品格。虽然那些高调的儒家知识分子有时候把道统强调得很厉害,将道统摆在优先于政统的位置上,但结果并不理想:不是外在世俗政治力量过于强大,挤破了脆弱的道统梦想,就是知识分子带着编织好的道统花环奔走于权门,主动投怀送抱,向政治献媚。道统不能独立,就很难摆脱“政统”的控制,最终可能成为现实政治的猎物或战利品。

在中国几千年封建历史中,曾经有过那么几次思想解放的契机。知识分子曾经试图从牢固的政治城堡中突围,但都没有真正突破权力的控制。

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黄金时代。在这个时期,知识分子的思想得到解放,他们爆发了空前的创造力。思想解放的结果,是思想的多元化,原初“醇天地,育万物,和天下”的“道”的格局走向分裂,“无所不

^① 陈思和:《陈思和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69页。

在”的道术分散成诸子百家,出现了“百家争鸣”历史局面,涌现了诸如孔子、孟子、庄子、荀子、墨子、韩非等各具思想个性的伟大思想家,显示了知识分子的智慧风采和人格魅力。知识分子所依恃的“道”得到现实社会的尊重,但他们心目中的“道”仍然是以人间秩序为中心。即便是以拒绝世俗欲望著称的庄子,也不过以一种极端的方式表现他与现实政治和社会的关系罢了。

但是,这种百舸争流的局面并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持,知识分子的道统还来不及加固,形成相对独立的思想王国,就被强大的外力击碎了。等到秦统一中国,大一统的政统确立起来。秦朝马上得天下,也是马上治天下。它以极端的方式扼杀知识分子的思想。“焚书坑儒”即是以暴力绞杀知识分子思想的极端例证。统治者的代价是巨大的,失去了知识分子为其提供合法性支持,仅仅依赖硬实力支撑起来的王国是十分脆弱的。因此,秦王朝很快走向灭亡。

历史上另一次知识分子的解放运动发生在明末清初。这是一场知识分子从内部突围的自救运动。知识分子看到,仅仅依附性地屈从于世俗政治,并没有改变知识分子的现实命运,更没有使得知识分子一厢情愿的道统梦想得以实现,反而越来越窝囊。他们于是开始可贵的反省和难得的觉醒,他们从内部进行颠覆,产生了爆炸性的效应。这场启蒙运动是对已经烂熟的传统儒家道统的反拨。一时间,涌现了诸如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等一批锋芒毕露的思想斗士。这些不按照知识分子常规出牌的思想另类,敢于怀疑既有的儒家思想及习惯思维,发出在当时的专制环境里惊天骇俗的异端声音。王夫之把批判的矛头指向封建专制主义的“正统”思想,即“五德三统”之说。“正统之说不知其所自防也。”“自汉之亡,曹氏司马氏乘之以窃天下,而为之名曰禅,于是为之说曰,必有所承以为‘统’而后可以为天下。义不相授受而强相缀系,以掩篡夺之迹,抑假邹衍五德之邪说与刘歆历家之绪论,文其诡辞,要岂事理之实然哉?‘统’之为言,合而并之谓也;而天下之不合与不续也多矣。”^①黄宗羲把批判矛头指向钳制知识分子思想的科举制度。“举业盛而圣学亡。举业之士亦知其非圣学也,第以仕宦之途寄迹焉尔!而

^①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三。

世之庸妄者遂执其成说以裁量古今之学术。有一语不与之相合者,愕眙而视曰,此离经也,此背训也。于是六经之传注,历代之动治乱,人物之臧否,莫不各有一定之说。”^①这种大胆的批鳞之论,如此狂言简直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可不是一般知识分子敢言的。顾炎武是开清学风气的思想家。他的矛头直指宋明理学,认为宋明理学属于虚理玄言。顾炎武主张实践,注重经验,崇“实学”,强调“格物致知”。这些主张无不摇撼了儒学传统的根基,在思想界内部制造了一场大地震,产生的影响也是颠覆性的。

但是,历史上这几次思想解放运动,虽然产生了巨大的震动,但传统巨大的统摄力量很快地收复失地。知识分子的惊天动地之举并没有彻底冲破围城的厚壁,并没有冲破知识分子身外的政治权力的控制,更重要的一点是,知识分子并没有真正摆脱他们自身对于政治权力的迷恋。他们的可贵努力没有真正推动整个社会的进步,他们有限的挣扎敌不过传统的力量超常的杀伤力和统合力,封建专制很快就重于收拾政统与道德。统治者或扼杀,或收买,知识分子的新生思想很快地就从历史舞台上退下了。

余英时认为,“知识分子从最初出现在历史舞台那一刹起便与所谓‘道’分不开,尽管‘道’在各家思想中具有不同的涵义。‘哲学的突破’以前,士因定在封建关系之中而各有职事,他们并没有一个更高的精神凭借可恃以批评政治社会,抗礼王侯。但‘突破’以后,士已发展了这种精神凭借,即所谓‘道’。”^②知识分子起先根据他们的价值理想和社会想像,精心构筑了“道”的精神领地,以此作为价值标准和社会评判尺度,来监督世俗社会和现实政治,这种“道”反映了人类文明初期的文化,也是初民社会人类发展历史经验的结晶,经过孔子这一代人的整理与发展,形成一个固定的价值体系。^③孔子注“六经”,目的是为了整理纷乱的社会动荡中分崩离析的价值体系,《易》主要是解决带有形而上色彩的哲学问题,《尚书》和《春秋》是解决历史问题,《礼》是解决政治学、伦理学的问题,《诗经》和《乐》是解决文学和艺术的问题。孔子是儒家思想的奠基人,他的思想一开始就带有鲜明的人世倾向和

① 黄宗羲:《南雷文案》,《恽仲升文集序》。

②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7—98页。

③ 陈思和:《陈思和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70页。

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

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仁”的出发点和归宿都在人心,“仁”强调“修身”,即人自身的道德修炼,仁与其说是一种教义,毋宁说是一种实践,一种身体力行的体验,因此,儒家知识分子的“修身”带有宗教的意味,但与西方的宗教有很大的差异:“中国的道统包涵了宗教的成分,但并不是一般意义上所谓的宗教;它不具备有形式的组织。以‘官师治教分’(章学诚语)的情况而言,它和西方文化中政教分立的状态未尝没有可以比拟之处。然而西方‘国家’(state)与教会(church)对峙的局面则从来不曾在中国历史上出现过。不但如此,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是从‘封建’秩序中的‘士’阶层蜕化而来的,他们也不能象西方专司神职的教士那样不理俗务。”^①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对“道”的把握多靠个人经验或体验做判断,带有很强的个人性的实践色彩,而西方的宗教则有较为明确的价值规范即教义,有具体实在的组织形式,神职人员专司教职,他们不理俗务,宗教世界即超越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隔着难以混同的鸿沟,而中国的儒家思想则带有浓厚的人世倾向,与人们的日常伦理行为直接相联系,宗教、政治、道德三位一体,紧紧地胶着在一起,正加马克斯·韦伯所说:“儒教纯粹是俗世内部的(innerweltlich)一种俗人道德(Laiensittlichkeit)。”“儒教所要求的是对俗世及其秩序与习俗的适应,归根结底,它只不过是受过教育的世人确立政治准则与社会礼仪的一部大法典。”^②儒家提出了一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人生方案,“修身”是一系列人生追求的起点,后面连锁的人生阶段都由这起点推导而来。“修、齐、治、平”中的关键词是“修”,即个人“修身”,也就是个人依照儒家的理想目标去实践的人格修炼。这是一种十分精英化的理想,先做到人格的完善,道德的完善,方能在家庭、社会、国家有真正的作为。儒家有一种理想:只要个人、社会、国家按照他们设计的方案去一步步落实,社会就会美好起来,人性就会得到完善。儒家迫切渴望他们心中的理想得以实现,渴望他们心中的“道”能在人世间得到落实。但“道”在实践中落实,在俗世中兑

①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第100页。

② 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洪天富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8页。

现,不是按照儒家的理想逻辑,而走的是纯粹的精英化道路。在具体落实过程中,存在这三种路径:一种是在精英当中落实,即知识分子中以“道”自任,“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①,甚至不惜以身殉道。其次,通过儒家知识分子自身的政治实践,让现实政治能够贯彻自己的价值理想,儒家的理想是教育权力者依照他们的理想设计去管理国家,组织天下,行使手中的权力,即要政治从属于“道”,“势”遵循“道”的逻辑。但是,现实的纷乱以及政治的僭越往往只会把“道”作为意识形态的工具,在权力的铁砧之上,儒家的“道”的理想显得十分脆弱。再次,至于普通俗人的日常人生实践,儒家思想有一巨细皆具的抱负,想让其理想落实到寻常百姓当中,使之具有普泛性。有学者认为:“早期儒家确立起伦理主导政治,以政治来实践伦理规范的大思路之后,他们就势必要将伦理准则深入到社会各个领域,从中树立伦理的至上权威性,以期达到伦理本身的自我实现。”^②这种理论追求和社会抱负与其说是早期儒家的伦理政治构想,不如说是儒家思想中的一贯追求,是儒家思想割不断的政治伦理情结。问题是儒家精英知识分子的一厢情愿的理想主义构想一旦落实到粗鄙的现实之中,落实到千差万别的芸芸众生之中,就可能会大大走样,毕竟普通老百姓对儒家的德性理想的理解和实践的程度,与儒家精英分子存在很大的距离。因此,儒家为了有效保证其理论构想的贯彻,以有形具体的“礼”来设立规矩,对人们的日常行为进行规范和约束,将整个社会以伦理规范的形式加以秩序化,从而把整个社会中的人与事置于一张巨大的网络之中,实现了根深蒂固的社会控制。儒家知识分子的这些构想正中权力者下怀,封建统治者把儒家思想经过巧妙的改造就转化成自己的意识形态系统。儒家知识分子本来想用自己的“道”在实践中驯化君主和改造君主,但在实际运作过程中,“道”却被“势”利用了,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讽刺,也是“道”的悲哀。虽说在早期儒家不无豪迈地说:“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③“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④但真正做到这一

① 《论语·泰伯》《四书章句集注》,上海书店影印本,1987年版。

② 任剑涛:《早期儒家伦理政治构想》,《学术月刊》2000年11期。

③ 《孟子·尽心》《四书章句集注》,上海书店影印本,1987年版。

④ 《论语·泰伯》《四书章句集注》,上海书店影印本,1987年版。

点的人毕竟寥寥无几。后来的儒士大多违背了自己理想主义的精神追求,他们的人格战斗精神也渐渐萎缩了,出于世俗功利的诱惑,主动投诚献媚,或迫于现实政治的黑暗,被动地全命保身,不惜割让“道”的领地,放弃理想尊严,从而沦为专制权力者卵翼之下的犬儒或仆人。这样,儒家的“道”反而给政治统治提供了意识形态的合法性支持,儒家知识分子多数成了封建专制的奴仆和工具。陈思和先生指出:“所谓的封建君主专制,有相当一部分内涵是掺杂了古代知识分子共同建立的文化专制。”^①此论深刻地揭示了专制的文化根源。令人痛心的是:儒家思想被政治利用以后,儒家知识分子赖以安身立命的“道”的尊严也遭到了亵渎和摧残,儒家知识分子被拉上了权力的战车,在历史角斗场中充当权力斗争的工具或任权力挤压、摆布的傀儡,知识分子的道统遭到政治的侵入和腐蚀,失去了原初的纯粹和坚定,“道”不能以完整的形象自立,知识分子的人格也很难独立,即便还时有一些志士豪气冲天地大唱“道”的高调,但这种声音又很快被无情的现实吞没了。因此,传统中国儒家知识分子的修、齐、治、平的理想很少有自由张扬的历史契机,即便有,也是有限度的,那就是知识分子的那套价值体系即所谓“道”不能越出政治自身的逻辑,他们必须让“道”屈服于“势”。不管知识分子在自己的书斋里怎样地放言高论,呼吁“势”屈从于“道”的律令和诉求,可只要儒家知识分子不减济世热情、入世追求,他就不得不忍痛看到“道”在现实情境中遭到政治权势和世俗力量的侵蚀。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陷在政治权力的陷阱中无法自拔的一个重要的原因还在于科举制度。

科举制度自隋唐时代建立起来之后,就成为政治权力束缚知识分子思想和人生理想的牢固枷锁,难怪唐太宗目睹那些从千军万马中一路拼杀出来的科甲新进者,十分得意:“天下英雄,入吾彀中。”^②唐太宗一语道破了统治者心中的玄机。在科举制度建立以前,中国的文人学士始终是一个令统治者十分头痛的大难题,这些知识分子多有济世、平天下的政治情结,他们

① 陈思和:《陈思和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69—170页。

② 《凌霄一士随笔》,《国闻周报》第6卷,第2期,第1—2页。